



在欢迎福田教授来华讲学 开幕式上的致词

钟敬文



今天，我们请到日本著名民俗学家福田亚细男教授来做关于日本民俗学的系列讲座，这是我国学术界的一种荣幸！

福田教授70年代初毕业于日本东京教育大学。过去曾有一段时间在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民俗研究部专门从事民俗研究工作，后来在东京附近的新泻大学等几个大学教书，近年在神奈川大学大学院当教授。他是日本当代一流的民俗学家，他的研究，继承了柳田国男民俗学的传统，同时，还进行了日本村落民俗学的研究。

日本从30年代到60年代，在三四十年时间里，柳田国男的民俗学一直占支配地位，可以说，当时整个日本民俗

学的发展都是在他的指挥棒下进行的。到了70年代，形势有了变化。比较年轻一代的学者，如福田亚细男和宫田登教授等，不满足于三四十年来柳田先生已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而是继续发展，有所革新；但不是“革命”。所谓不是“革命”，就是说，他们不是全盘否定前

辈的学术成就，而是在他的基础上，根据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往前走；从大量新发现的民间资料和严密的学术论证出发，对柳田国男的学说提出批评、修改的意见。这就既保持了日本民俗学发展的连续性，也增添了日本民俗学的学术活力。

前几天，日本学术界的一位老朋友来访，我们彼此谈到现在日本民俗学的进展情况，他估计，从目前看，日本民俗学已同文化人类学差不多了。我个人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福田教授这次来北京后，我们彼此也交换了意见。我认为，全面地看，现在日本的民俗学还不是文化人类学。当然，搞文化人类学决不是坏事，但它究竟是另一门学科。福田先生也

同意我的说法。依我看,不妨说,出现了一些新的倾向,比如有一些民俗学者的研究带上了文化人类学的色彩;但整个日本民俗学并没有变成文化人类学,或者说被人类学所消灭,这是一个事实。两者虽然是有一些关系的学科,但究竟是两种学科。

在日本现代民俗学的学坛上,福田教授和宫田登教授,堪称一个新起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这一派的书,我也看了一些,但年纪大了,看得很慢,我也用功不够,算不上一个好学生,但我是大略地知道一些的。比如说,他们的理论,在认识日本民俗学的范围、对象和研究方法上,是给予了相当拓展的。本世纪的上半期,柳田先生在确立自己的学说时,把它叫做乡土研究,或者民间传承,当时他没叫民俗学。这里面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他把注意力放在了一战后的日本农村和农民问题上,这使他的民俗学的对象范围,是以传统农村为主的。作为一种开拓,他的工作非常了不起。但从学科整体的体系构架看,它肯定是不完善的。日本自出现都市到现在,已有很长的历史,难道这些都市就没有民俗吗?如果有,它们能和农村的民俗完全一样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柳田先生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他其实也接触过这个方面,但他还是说,都市民俗学就是乡村民俗学的延伸,这就说明了他的学术兴趣和功力不在这个地方。现在大家学了民俗学,都知道,这种说法,从常识来讲,分明是不准确的。就拿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情况来讲,也是说不通的。中国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人口都是农民,到现在,由于多种经济的发展,职业人口的比例有所变化,但绝大多数还是农民。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也很早就发展了都市,春秋战国时的燕和赵这些地方,都有大都市。齐、鲁一带的都市,还发展得相当热闹,据说民宗百艺,“甚富而实”,这些在《战国策》和《史记》

等文献里都有记载。它们后来已发展了一两千年,能说它们不再产生自己的民俗吗,那不可能。因此,拿都市和农村相比,在人口和地盘上,虽然过去相差悬殊,把农村比做一个大指头,都市只是一个小指头。但大指头虽然大,却慢慢地变化;小指头虽然小,却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所以,理想的境界是,农村与都市,都要发展。农村不能总是落后,都市也决不是农村的尾巴。像柳田国男这种农村一体化的观点,就不合适了。后来福田和宫田登教授等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

柳田国男民俗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主张一国民俗学。民俗学基本上是一国的。但由于人类生活的复杂性所决定,在“一国”的前提下,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需要讨论。比如,人们的生活经常要移动,在中国、日本和韩国各自“一国”的境内,就都有很多移民人口。他们随着历史上迁徙的足迹,把故土的文化也迁徙过去了;此外,还有别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往来等。仅从中国的情况来讲,就在两千多年前,与邻邦韩国和越南等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在彼此的人民成分、文化和政治上,都长期互相渗透、交流。这已成为一种历史。那么,要研究中国的民俗(当然我们也强调一国民俗学),对周边民族的民俗文化,就不好完全忽略了,这恐怕是民俗史本身的一种制约吧。

在日本,柳田国男先生主要研究大和民族。大和民族是日本的主体民族。但就在他开展研究活动的30年代,日本也还有自己的少数民族阿伊努,中国旧译为“虾夷”,他们同样是日本国民,柳田先生却不大重视这些。另外,在日本三岛以外的朝鲜、台湾,当时也属于日本殖民统治的管辖地,直到在二战时期,相互还在政治、军事上存在一定的关系,柳田先生同样不大管这些。他只承认冲绳(琉球),认为冲绳人在血缘上与大和民族有关,



是可以进行一国民俗的研究的。其实,这种看法也不是准确的。现在,福田教授等的研究,视野就开阔多了,研究的结论也比从前更为精细。像冲绳的民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日本本土的民俗文化相关联?又究竟有多少成分是受了中国明清文化的影响?北海道的阿伊努人作为日本的国民,在民俗上与大和民族到底有哪些异同点?他们都给予了一定的说明。

大家知道,从事学术研究,除了理论发明,建设方法论也是很重要的。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方法论也很有名,一个叫重立证论,一个叫方言周圈论。当然,他还使用了其他一些广义的方法,这里就不讲了。仅从这两个方法来讲,它们在当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再好的方法,它的适用程度,也不是无限的。方法就是方法,它不是万金油。柳田国男作为日本民俗学的创始人,无疑是大师级的大学者。然而,任何伟大的人物都有限制,柳田先生同样不能避免。所以,到了福田与宫田登他们这一代,就要对传统的民俗学方法加以批判、调整,重新来确立民俗学研究的科学手段和现代方法论了。

他们两位发展了柳田国男的民俗学,但在学问态度上,又是对柳田先生极为崇敬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好的学生是应该能做到对真理的尊重过于对老师的崇敬的。不过,说到福田教授,他还不是柳田国男先生的学生,而是他的学生的学生,第三辈。但在学术上讲,他是继柳田的传统之后,突出地向前的。前面说过,柳田时代的民俗学,以农村和农民为主体;但在福田和宫田登两位所主编的《日本民俗学概论》(1993)里,在第四部分《特论》中,就增设了“都市的民俗”的内容。当时其它日本民俗学著作都没有“都市”这一章。他们在方法论上,提倡地域民俗学,这和柳田国男相比,也是新的发展。现在,地域研究法,人类学也

用,这几年在我国也很流行,但福田教授的优点是,在强调地域研究的同时,也注意进行区域间的比较研究。这就使他能提出许多难得的创见。应该说明的是,柳田国男也搞比较,但比较的范围、方法,同福田不一样。

不仅对柳田这样的学术前辈,就是对一般的学者,只要是在某一点上做出了学术贡献的,福田教授同样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这种科学态度和学者胸怀,也是值得同学们学习的。日本有一位自学成才的马克思主义者、民俗学家,叫赤松启介,出版过一本《民俗学》,后来绝版了。此书再版时,福田教授认为它有价值,就撰文大加称赞。福田教授自己是学院出身,在学术上又有很大的名气,现在他当了日本民俗学会的主席,完全是靠学术实力赢得的社会地位,不像中国,可能有许多其他因素才能达到这个位置。但他并不因此而自视过高,反而还能真诚地肯定非学院出身的自学者,没有门户之见,没有学阀的霸气,这种学者的品格,也是高尚的。

福田先生是一个日本学者,但他对中国的民俗也很感兴趣,可能是因为中国同日本的关系比较密切吧。这几年,他差不多每年都到中国来调查,而且每一年都发表田野作业报告。他对中国,不仅是提供学术资料,而且对中国人民也有感情,爱中国的文化,我们从一件小事里就可以看出。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送了一个研究生到日本联合培养。她的日语比较好,我们也想把民俗学的门打开,就请福田教授帮忙。福田教授当时还在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工作,也带研究生,就接受了她。日本教授对本国的学生很严格,对中国的学生就不一定。但福田教授非常尽职,不是放羊。他经常指导这个学生读什么书,读了还要来问,同这个学生面对面地讨论。他也让她下去,做田野作业。后来,这个同学回来了,1993年

得到了博士学位。我的意思是说,福田先生不仅作为一个学者很谨严,作为一个田野作业者很出色,而且作为一个老师也很认真。他是可以做我们的示范的。

80年代,有一个日本访问学者在中国学习,她问我,我30年代在日本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去见柳田先生?那时柳田国男的代表作《民间传承论》(1934)和《乡土生活研究法》(1935)刚刚出版,他正在确立他在民俗学上的地位,我刚好在那里。这位访问学者知道我同柳田先生本人一直没有接触,但我写过文章,介绍过他的《民间传承论·导言》。好像最近有一本日本的柳田国男辞典,上面收了写我的一个词条,说到我同柳田先生的学术关系(野村纯一等《柳田国男事典》,1998),但事实上,我在那里没有见过他。这很奇怪,当时我在日本,主要是学习民俗学,那为什么不去见他呢?这个大师的著作,就天天摆在我的桌子上,这是什么道理?我当时对这位日本访问学者的问题做了回答,这次我同福田先生谈话,也谈到这件事。我回想,像柳田国男这样的民俗学家,是世界级的,不是国家级的,我当然非常敬佩。但我当时没有请教他,也有自己的理由:第一,柳田国男先生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大和民族;除此而外,他对本国的少数民族都不大热心,对我们中国的事情就更加疏远了。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你要去请教他,他就一定能回答你什么,或者他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他不研究,他就可能不谈。第二,我那时30多岁,年纪轻,学问也还很幼稚。你要去见一个大师,同他对话,这与他是很不相等的。我想自己还是有自量之明的。所以,我当时没有去见他。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我离开日本,回国后,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一晃60多年过去了,现在日本的民俗学也已涌现了很多后起之秀。他们中间有的人说:“钟敬文是中国的柳田国男”,我不敢当。我对他们说,我应该做柳田先生的学生。

总而言之,福田和宫田登教授等少

数新派的学者,是在主宰了几十年的柳田国男民俗学的基础上,发展了他的学说。我们不用“革命”一词,福田先生也不赞成是“革命”,同意是发展。

福田教授从70年代就出版他的著作,到现在,他在这个领域里已经工作了20多年了。他出的书,和他编的书,已有十几种。在他的个人专著中,很有份量的,是《日本民俗学方法论叙说》(1983)。他还有关于时间民俗学和空间民俗学等方面的著作。可惜我们都没有翻译。几年前,我曾邀请日本庆应大学在中国的访问学者桐本东太写了一篇文章,专门介绍福田教授的《日本民俗学方法论叙说》,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可能看到的人不多。

80年代以后,中国民俗学获得了迅速地发展。民俗学科已从它的游击战的地位提高到了正规战的地位。自1997年起,教育部已正式把民俗学列为高校课程。过去民俗学是民间自己搞的,或者是少数学者搞的;现在终于能使它的发展更加合理化,变成在大学、研究院里的正式学问了,这表明了我国民俗学的进步。但是,这种学科的扩展,距离它的诞生,已经足足80年了,这说明一门新学术的发展道路是不平坦的。

目前,我国的民俗学科还在蓬勃发展,学术队伍还在壮大。我们为了训练队伍、加强理论建设,要求同学们打好国学基础;同时,也要向海外的同行学习,尽快提高国内的学术水平。百日维新前后,一些中国的有识之士,就曾延请日本学者来中国做教师,推动了国内的思想启蒙运动。本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为了发展本民族的民间艺术,也曾聘请了日本木刻艺术家前来兼课。我希望,福田教授的这次到来,同样能对促进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对推动中日两国的民俗文化交流,起到它的历史作用。让我们再次地以热烈的掌声,感谢福田教授来华讲学,一并祝他讲演成功! (董晓萍 整理)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